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9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6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中国晚清翻译选择的演变研究

张佳
昆明理工大学
DOI:10.12238/er.v9i1.6771

[摘　要] 晚清时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正经历第三次翻译高潮。作为构建现代文化的重要工具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翻译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本文通过分析晚清时期的翻译选材、目的与主题，揭示了翻译作品的选择经历了从西方实用科学典籍，到西方及日本的社会科学、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类书籍，再到历史、言情、哲学、心理等各类小说的转变。翻译作品的来源国也从单一的西方国家转变为多个西方国家，后期日籍翻译成为主流。这一转变反映了特定历史语境下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建制之间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 晚清翻译；翻译选择；西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A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Translation Choic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f China

Jia Zha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China became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facing the critical moment of national salvation. From the Opium War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hina is experiencing the third wave of translation. As an important tool to construct modern culture and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ranslation has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reform and progress of China's modern society. By analyzing the selection, purpose and theme of transl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ed works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western practical scientific classics to western and Japanese books in the fields of social science, ideology, culture and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n to different kinds of novels such as history, romance,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The source of translated works has shifted from a single Western country to multiple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later period, the translation of Japanese books became the mainstream. This shift reflect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social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translation; the choice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引言

翻译作品的选择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需求和审美取向。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为了救亡图存，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倡导学习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在这一时期，翻译成为知识分子引进西方技术、政治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渠道，翻译活动在此期间蓬勃发展，故这一时期的翻译高潮被称为西学翻译高潮。然而，由于政治观点和价值观的不同，中国不同的翻译行为主体从事着不同的翻译活动，这些活动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本文将晚清时期的翻译活动置于历史文化语境中，系统梳理该时期翻译作品的选择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深入探讨翻译选材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及其与当时社会变革的关系。本研究旨在厘清翻译与文学改良、翻译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并为当前中国的文化交流与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与启示。

1 文献综述

关于晚清及民国初期的翻译研究可分为三类。第一类通常研究翻译行为主体的翻译活动。例如，熊杰[1]考察了晚清不同时期传教士对译者作品的选择。黄慧[2]梳理了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翻译出版的历史。许多学者也研究了严复、梁启超、林纾、马建忠等杰出翻译家的翻译思想与特点。王洪涛[3]对马建忠的“善译”理论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阐释与理论形态转化。袁进[4]研究了林纾对晚清小说翻译及中国文学发展的贡献。伍媛媛[5]探讨了梁启超与晚清西学翻译。第二类从翻译理论视角分析文本，总结翻译特点。例如，张鲁艳[6]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从目的论的角度审视晚清翻译文学。吴南松[7]以晚清小说翻译批评为例，分析了功能翻译理论及其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第三类是针对特定主题的翻译内容研究。苏艳[8]研究了甲午战争后晚清翻译界对国民“军人意识”的培养。夏军和杜成林[9]探讨了晚清翻译人才培养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研究。然而，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对特定译者、机构或理论应用的个案分析，对于晚清翻译选材的整体演变脉络、其内在动因及各阶段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尚缺乏一个系统、动态的宏观梳理。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2 晚清翻译选材的演变

晚清时期，翻译材料呈现多样化。本文分两个阶段考察翻译材料。

2.1 甲午战争前的翻译选材（1840-1894）

晚清初期，翻译材料主要为西方史地类书籍。林则徐为了禁烟、抗击英国侵略者、探求域外情形以知己知彼，设立译馆，编译了瑞士瓦特尔《国际法》和《世界地理大全》的相关篇章。他还派人购买并翻译西方报纸，以了解西方。

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将失败归咎于军事和武器的落后，由此形成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相关技术类书籍随之成为翻译主流。魏源编纂了《海国图志》，这是一部综合介绍西方国家科技及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书籍，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此外，新教传教士设立的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等机构也从事翻译出版。鸦片战争爆发前，传教士的译介以宗教文献为主，占比 76%，世俗内容则首推史地与天文。至五口通商时期，墨海书馆与花华圣经书店等机构出版的书籍仍以宗教类为核心，占比约 80%，但自然科学类世俗书籍的译介比重大幅增加[1]。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认识到先进技术需要科学知识作为支撑。因此，除翻译西方军事技术书籍外，此期也翻译了大量自然科学书籍。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开设了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官方翻译机构，主要翻译法律、机械、军事、数学、测算、电学等实用科学技术知识。洋务运动兴起后，翻译活动大增，仅李善兰一人就翻译了两方自然科学著作 80 余部。洋务运动时期，官方翻译机构的建立系统化地推动了西学翻译，其人才培养和翻译实践为后来的社会变革奠定了基础[9]。

洋务运动初期，国内既通西语又懂西技的人才匮乏，因此聘请了伦敦会出版社、广学会、格致书院等翻译机构的许多传教士从事应用科学翻译，这些传教士在此期间也同时从事宗教书籍的翻译。这一阶段的翻译选材呈现出鲜明的“器物优先”特征。其核心逻辑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决定了翻译的实用主义和工具导向。所选文本集中于能够直接解决军事、技术困境的知识，体现了在面对西方冲击时，士大夫阶层试图在不触动儒家文化核心的前提下，通过技术补强来维护现有秩序的努力。

然而，晚清许多士大夫认为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不可动摇的，特别是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早熟及其所保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自我中心意识，即华夏中心主义[10]，这导致当时文人认为西方文学文化无法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提并论，只需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即可。因此，洋务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2.2 甲午战争后的翻译选材（1895-1912）

甲午战争战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认识到，西方之强盛不仅在于科学技术，更在于社会制度与文化。于是，他们在主张政治改革的同时，也将翻译焦点从实用科学典籍转向哲学和社会科学书籍。为此，他们大量译介日本书籍。梁启超更明确提出“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的宗旨，将日文转译视为推动维新变、开启民智以图救亡的关键[5]。据统计，1896 年至 1911 年间，中国共翻译日文书籍 958 种，覆盖十个门类，年均 63.86 种[11]。

中国的文学翻译虽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但其真正形成规模并承载明确的社会改造使命，则在甲午战争之后。晚清末年，许多知识分子痛感政治改革的失败，转而将“改造国民思想”视为救国的根本途径。于是，小说被推向了历史前台。从目的论的视角看，晚清知识分子普遍“把小说当作革新政治的工具，用小说来提倡维新与改革”，其译介活动的核心目的正是利用文学的社会功能来实现启蒙与变革[6]。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的倡导，便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这种以文学“新民”的思潮下，翻译选材呈现出高度目的性与系统性。研究表明，翻译界将救国希望寄托于“以兵魂重塑国魂”，其选材也系统地转向了旨在培养尚武精神的新闻、传记与小说[8]。而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 年）所引发的轰动，则从实践层面证明了小说无与伦比的社会影响力。它不仅风靡全国，改变了国人对西方文学的偏见，更极大地提升了小说在文类中的地位[4]。自此，翻译小说之风彻底盛行。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统计，1902 年至 1918 年间，中国翻译小说达 4392 种[12]。

这股潮流亦得益于出版印刷业的繁荣。晚清民初涌现的三十余家报馆，成为译介活动的重要推手。它们不仅摘译西方报纸，更大规模地编译各国书籍，使得文学翻译的内容从单一的政治小说迅速走向多元，涵盖了侦探、科幻等多种新兴类型。梁启超译《佳人奇遇》、程小青等人合译《福尔摩斯探案集》、鲁迅译《地底旅行》等，均为典范。

这一历程标志着晚清翻译选材实现从“格致之学”到“社科之学”到“文学之美”的纵深拓展。其焦点从外在的器物与制度，深入到了内在的思想、情感与想象力层面，完整地勾勒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思想轨迹。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3 影响翻译选材的因素

晚清翻译题材的演变，是社会政治危机、译者主体目的与文化心态三者互动的结果。

3.1 社会政治危机的驱动

晚清翻译选材的每一次转向，几乎都与一次民族创伤紧密相关。晚清许多有识之士提出救国主张，倡导学习西方技术与制度，不同的翻译心理与动机影响了他们的翻译选材。林则徐、魏源在“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开展翻译活动，翻译西方史地相关书籍。洋务派提出“自强”与“求富”的主张，翻译了大量军事装备和实用工艺类书籍。甲午战争的惨败击碎了洋务派单靠技术救国的幻想，促使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将翻译焦点转向西方和日本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方面的著作，旨在“变法图强”。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则进一步将翻译目标深化至“改造国民性”。这一转向具体表现为翻译界对培养国民“军人意识”的高度重视[8]，从而推动了以启蒙民心、塑造新民为目标的文学翻译大潮。

3.2 翻译行为主体的目的性

不同的翻译主体，基于其身份、立场与目标，直接决定了其翻译选材的具体取向。晚清初期的翻译活动属于自发翻译，主要由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人士进行，选材有限，影响亦有限。洋务运动开始后，清政府在“自强”目标下设立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机构，翻译活动进入自觉翻译阶段，选材集中于军事、科技与实用工艺。知识分子如维新派，以“启蒙”与“救亡”为己任，选材侧重于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小说与社科经典。传教士一面出于传播基督教的职责翻译宗教教义书籍，另一面受聘于官方翻译机构译介西方实用科学技术知识。晚清民初民间出版机构，为满足民众文化需求、开阔民众视野，大量译介了西方科技知识和富含异域文化的科幻、侦探小说等。

3.3 文化心态的制约

“华夏中心主义”文化心态[10]与“中体西用”思想，长期将翻译范围限制在“器物”层面，对于西方核心的哲学、宗教与价值观念著作持保留态度。即便在后期大规模引介西学时，译者也常通过序、跋、按语等方式对原著进行“中国化”诠释，使其能够在固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被接受。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实质上扮演了文化“守门人”的角色，其序跋的功能远非简单介绍，而更在于引导甚至规训读者的理解方向，确保文本的传播与接受服务于特定的文化政治目的[13]。

4 结论

晚清翻译选材从科技、制度到文化的演变轨迹，清晰勾勒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从表层到内核的思想历程。这段历史表明，翻译绝非价值中立的语言转换，正如目的论与功能论所揭示的[6,7]，其本质是在特定历史权力关系中进行文化选择与重构的政治实践。因此，“翻译什么、为何翻译”根本上是由历史条件、权力关系与主体意识共同决定的战略抉择。这为当今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关键启示：我们必须在保持开放的同时，坚守文化主体意识，通过前瞻性的译介规划，才能在跨文化对话中赢得主动权。

[参考文献]

[1]熊杰.晚清新教传教士翻译选材研究[J].语言与翻译,2012(2):61-64.

[2]黄慧.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翻译出版史梳理[J].出版广角,2016(6):39-41.

[3]王洪涛.中国传统译论基本理念的嬗变与衍化——马建忠“善译”理论之现代诠释[J].外语学刊,2005(1):89-94.

[4]袁进.试论晚清翻译小说与林纾的贡献[J].明清小说研究,2011(1):171-182.

[5]伍媛媛.梁启超与晚清西学翻译[J].北京档案,2023(6):60-62.

[6]张鲁艳.从目的论角度看晚清翻译文学[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188-190.

[7]吴南松.功能翻译理论及其在文学翻译批评中的适用性——以对晚清小说翻译的批评为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3):69-73.

[8]苏艳.甲午战争后晚清翻译界对国民“军人意识”的培养[J].外语教学,2019(1):90-95.

[9]夏军,杜成林.晚清翻译人才培养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研究——化西与西化之间[J].中国翻译,2022(3):39-47+191-192.

[10]管新福.文化心态对晚清西学翻译的抉择及影响[J].中华文化论坛,2019(2):14-21+154.

[11]何娟,余炫朴.晚清西学东渐的译写选择及逻辑转向解读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138-144.

[12]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13]耿强.副文本与中国翻译话语的再考察(1949-1966)[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26(3):118-128.

作者简介：

张佳（2000.05-），女，白族，云南大理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译材演变与动因。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